

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科学传播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 刘雨薇

在当前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信息生态的背景下,科学传播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变革。这不仅关乎知识普及,更是一场涉及信任重建、伦理准则、科技向善与文明对话的深刻实践。面对社会信任危机、信息茧房固化与全球共识难以凝聚等挑战,如何重构科学传播路径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紧迫议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欧洲史教授乌里希·提道(Ulrich Tiedau)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信息学系数字人文荣誉教授西蒙·马奥尼(Simon Mahony)。他们从历史纵深与数字前沿的双重视角出发,共同探寻全球科学传播的未来路径。中英高校间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紧密合作,正为全球科学传播注入有深度、温度与韧性的关键力量。

科学传播遭遇公众信任危机

任何科学只有传播出去,才有可能发挥它的价值。马奥尼表示,当今世界在面临技术飞跃的同时,也深陷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政治动荡与虚假信息泛滥的多重危机之中。社交媒体算法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系统性地侵蚀信息的可信度,“在西方,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媒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信任公共机构,已成为问题。”在此背景下,科学若固守象牙塔,其价值将无从实现。科学并非孤立存在,其价值恰恰取决于向公众传播的有效性。科学传播必须透明、易懂,并建立在伦理责任之上,否则错误信息将不断吞噬公众的理解与理性决策空间。

提道则从历史视角出发进行了更深层的反思。他认为,科学知识的传播方式始终影响着其社会作用的发挥,而“科技向善”的观念也并非永恒中立。“在19世纪,西方科学话语常被用于为帝国扩张辩护,所谓‘进步’也被框定在欧洲主导的叙事之中。”这一历史背景警示我们,科学传播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传递。如今,随着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风险有增无减。通过列举互联网流传的歪曲殖民历史、气候

科学政治化与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等现象,他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传递历史真相,更要培养公众对“知识如何构建与共享”的批判性思维。这种基于几个世纪思想传播史所积淀的批判素养,正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失序的重要防线。

智能媒体在高效连接世界的同时,也编织出坚固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扭曲了公共领域的认知逻辑。马奥尼生动描述了这一机制:当用户与观点相近的人互动时,算法会不断推送其认为用户“喜欢”的内容,从而强化固有观点与无意识偏见,限制对多元视角的接触。“我们‘点赞’越多,看到的同类内容就越多。”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不仅加剧了社会对立,更成为科学怀疑论(如反疫苗言论、气候变化否认论)滋生的温床。马奥尼告诉记者,传统广播传播模式已经失效,科学传播必须实现范式转变,从单向灌输转向结合具体情境、针对特定受众的深度参与。传播者需善用叙事技巧、可视化与互动形式,将基于科学证据的信息有效融入文化、政治与认知背景中,从而建立公众信任。

那么,如何有效评估这场范式转变的实际成效?马奥尼以2024—2025年度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共同设立的“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气候叙事联合研究”种子基金项目为例,展现了前沿研究方法在科学传播中的具体应用。通过情感分析与网络参与度等多维指标,研究团队力求衡量传播内容对公众认知与科学信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旨在推动科学传播走向一个可测量、可优化、可优化的科学新阶段。

提道则从思想史角度拓宽了“破茧”的深度。他将当下的“信息茧房”与20世纪初西方媒体中优生学等伪科学的传播相类比,揭示了此等现象的历史根源。在他看来,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赋能受众,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与数字人文方法的融合,为这一构想提供了适用的“解题工具”。“数字文本分析有助于追踪大规模数字化档案(如报纸)中的情绪和错误信息,而网络分析则可以绘制科学和伪科学思想在历史传播流中的扩散路径。”提道解释说,“这些方法不仅能诊断当前科研诚信危



■西蒙·马奥尼(Simon Mahony)



■乌里希·提道(Ulrich Tiedau)

受访者/供图

机、学术公信力危机的根源,更能通过揭示历史脉络,赋予公众批判性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

科学叙事与跨学科合作 构建科学传播范式

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故事讲述依然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马奥尼援引叙事理论与修辞学研究,叙事能为科学传播赋予不可或缺的结构、情感共鸣与可及性。“故事能将抽象的科学概念与受众的生活经验相连,使复杂思想变得可感可知。”但他也提醒,叙事技巧同样可能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科学传播者辨别真伪的关键在于扎实的学术训练——必须“寻找来自稳健方法论的证据,并批判性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因此,科学传播中的叙事必须坚持透明、易懂,并始终植根于可重复的实证性研究。

提道则将叙事提升至文明认知的高度。他认为,历史学家从零散证据中构建连贯的故事,与科学家解释复杂自然现象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叙事既可凝聚共识,也可扭曲真相。为向大众讲述负责任的科普故事,他提出应借助历史学等领域的核心批判方法,包括情境化与三角互证。

人工智能时代更为此增添了新维度,提道表示:“数字人文引入计算方法,可在大规模语料库中识别模式、隐喻与系统性忽略;‘远读’作为一种代表性方法,有助于标识文本中的不一致性与潜在偏见。”“包容的叙事需主动纳入多元声音,而唯有融合叙事艺术、批判思维与计算

分析,才能构建出更具反思性、更具公平性、更具温度的科学传播范式。”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已非单一学科能够独立应对。跨学科合作以及人文科学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正成为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关键。马奥尼告诉记者,信息的传播方式已变得与信息本身同等重要。他以数字人文领域为例,阐释了这一学科如何搭建沟通的桥梁——通过将计算方法与文化分析相结合,使艰深的科学数据转化为非专业受众也能够理解的内容。同时,他也特别提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的开放教育对于提升科学传播效率具有重要价值。正如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将所有出版物通过开放许可协议免费传播的实践所示,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

正当人文科学在高校面临被边缘化危机之际,提道却看到了一个弥合传统科学与学术之间传统分野的历史性机遇。他认为,这恰恰是彰显人文科学独特价值的时刻,数字人文的兴起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有力回应。他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这一新兴领域如何为科学传播注入不可替代的力量。例如,一个绘制流行病地图的数字人文项目,能够将冰冷的流行病学数据与鲜活的公众反应、政策选择交织呈现,让健康知识在历史语境中变得立体而深刻。

在提道看来,数字人文不仅能够追溯科学思想的演变,更通过数字化档案揭示科学发现与社会背景的深刻互动。计算社会科学可以批判性地考察科学事实与公众信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而开放教育平

台可以来源评估、历史推理与伦理批判等人文科学核心方法系统融入公共科学教育,最终培养出既懂科学又具备历史视野与反思能力的现代公民。

开放合作为全球科学传播 注入动力

在科学传播推动全球对话的过程中,中英学术机构间的合作正成为富有启发性的实践范本。马奥尼在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中收获颇丰,尤其在“研究成果的传播沟通”与“技术创新与文化社会需求的平衡”方面,获得了宝贵启发。他特别指出,像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共同设立的合作项目,就充分展现出中英两国在跨学科、跨领域与跨文化合作上的巨大潜力——这种协作不仅面向前沿科学问题,也直面重大社会挑战。

马奥尼也提醒,此类项目若想取得更具突破性的成果,离不开持续的制度支持与专项资金保障。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推动跨学科与文化、既具备情境意识又富含尊重与包容的深度对话。

提道对此深表认同,并从基础设施层面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愿景。在与中方信息科学学者的交流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同行在数据组织与分析上的宏大视野与精密方法,尤其在处理历史与文化数据方面展现出卓越素养。他认为,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那些“不存在通用解决方案”的复杂议题,中英双方应着力构建有效的知识共享框架,深化联合研究机制,建设开放可相互操作的数字化平台与标准体系,以系统化处理两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图像与其他文化遗产资源。

提道进一步举例说,中英学术机构可共同推动一项数字史学合作项目,整合双方环境历史数据,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与文本分析方法,共同探索长时段气候变化的规律与资源治理的适应性路径。这样的协作不仅直接服务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更能为应对现实挑战注入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也为设计符合文化语境的可持续方案提供深刻的文化洞察。

◇本报记者 白乐

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也是共享的遗产。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多元共生的客观要求。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在不断交流互动中演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如今,全球视野下的文明演进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大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劳曼(Lars Peter Laamann)。劳曼认为,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文明糅杂了多重因素。历史表明,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明能够独善其身。文明存在的意义与旨归所在,是从包容与开放中寻求共识,而非出于某种特定的权力目的而被称为“政治工具”。

文明的多维意义与相互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这一概念涉及价值、规范、风俗、传统等内容,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概念。对此,您如何解读?

劳曼:“文明”的确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概念,但我们很难用精准的话语去描述何谓“文明”。因为“文明”一词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多维意义上的概念。从传统意义上讲,文明是一个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术语。但如今,文明也与制度、外交政策等挂钩。

若单纯从哲学、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待“文明”,会发现一个完美形态的“文明”,即注重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然而,若从制度、外交政策等视角去审视“文明”,就容易将文明过度“政治化”,甚至产生将文明作为“政治工具”或“政治手段”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方面,人类需要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多样性有时也意味着竞争与分歧。在全球视野下,应如何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

劳曼:的确,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被置于全球语境中去考察。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以及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需要,必然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因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与分歧是正常现象。从文明起源与文明演进的角度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就不会不会持有一种“差异性”或“分歧性”主导文明的观念。

应当说,无论何种形态的文明,在演进轨迹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交融、共通之处。不论何种国家、民族或社会所拥有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相似的基本属性、特征、性质——在诞生之初到发展中期尤为如此。例如,都得经历从早期村落形态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转变,都得经历从城市雏形的初步形成到更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脉络中得到印证。

全球文明倡议凝聚合作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与中华文明注重和谐、均衡、合作等思想相比,西方文明更注重权力与竞争,这源于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的“优越情结”。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劳曼:任何一种文明在面对外来文明时,都有表达异议或反对的权利,但采取打击或打压的手段,显然是冲动而不理性的。这就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人们总是倾向于接纳与自己相似的人,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

当面对分歧时,我们可以委婉地告诉对方:“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或不相信你说的。”然而,若能保持基本的尊重与信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同存异——这才是更为高超的做法。事实上,当我们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去看待文明,就不会将焦点放在差异和分歧上,“文明优越”的情结也不会萌生。

可惜,如今一些西方大国经常放大文明之间的竞争特性。一些国际人士固执己见地认为,文明之间的竞争是巩固国家权力的需要,将其作为政治工具,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国际纷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身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而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可以视为应对现代问题、化解现代危机的有效方案。您对此有何评价?

劳曼: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致力于倡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并以此凝聚全球合作共识,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全球发展需要的美好愿景。中国用自身行动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启发、彼此借鉴至关重要。文明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世界和平的纽带,更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全球文明倡议是从宏观的全球视野去审视文明的重要主张。这一倡议将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作为文明演进的崇高目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当学会从过去汲取前进的智慧与力量,而非摒弃过去。如今,得益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正在蓬勃发展。现实已经证明,“文明共生共荣”的潮流势不可挡,必将大于文明冲突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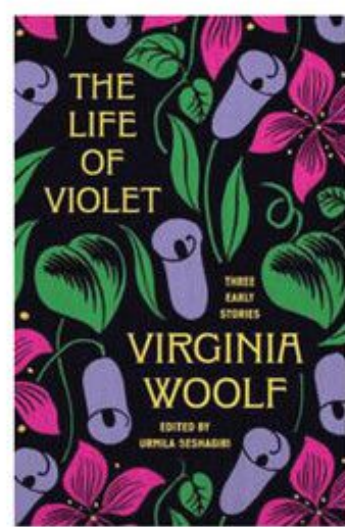
文明在包容与开放中寻求共识

新书 NEW BOOK

《维奥莱特的一生》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乌拉米拉·塞沙吉里/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0月出版了由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撰写、美国田纳西大学人文学科杰出教授乌拉米拉·塞沙吉里(Urmla Seshagiri)编写的新书《维奥莱特的一生:三个早期故事》(The Life of Violet Three Early Stories)。这是伍尔夫的早期作品第一次以最终修订的形式出版,讲述了一个充满幻想和滑稽的童话故事,是伍尔夫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发现。



《维奥莱特的一生》首次以最终定稿形式出版,融合了幻想、童话和讽刺,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女主角战胜了海怪,也战胜了令人窒息的社会传统。

在这些情节丰富的故事中,维奥莱特拥有“和她的身高一样神奇的力量”,她蔑视贵族的礼节,从建造“自己的小屋”中找到乐趣,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些故事充满了各种幻想,比如雪花般的糖杏仁和彩绘的鸵鸟蛋做成的浴缸。《维奥莱特的一生》摒弃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必须在美德和野心之间做出选择的观念,颂扬了女性的友谊。(龙豪/编译)

11月4日,埃及博物馆在埃及吉萨正式向公众开放。埃及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成开馆。

图片来源:东方IC



动态

考古发掘揭示贝宁王国发展历史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10月30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官网刊发消息称,近期在尼日利亚贝宁城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中,研究人员探索了西非贝宁王国历史宫殿中此前未被涉及的区域,为理解贝宁王国的发展及手工艺实践提供了全新视角。此次发掘是西非艺术博物馆(MOWAA)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贝宁城曾是贝宁王国的首都,这个帝国以其精湛工艺闻名于世,尤其是贝宁青铜器给全球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1897年英国

入侵导致贝宁王宫被毁,贝宁王国覆灭。随着现代城市发展需要,西非艺术博物馆、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和古迹委员会(NCMM)与大英博物馆组成联合团队,对贝宁王国历史宫殿遗址进行了50年来首次系统发掘。

“发展建设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确保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西非艺术博物馆考古项目负责人塞贡·奥帕德吉(Segun Opedeji)表示,“不了解过去就无法进步,我们需要连接历史与未来”。正在建设中的西非艺术博物馆将在储存、保

护和研究方面为西非考古项目提供专业的设施和服务。大英博物馆项目研究负责人萨姆·尼克松(Sam Nixon)表示,这项考古工作为西非艺术博物馆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此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一个考古序列,其时间跨度从贝宁王国建立之前一直到其衰落和殖民时代,建立了迄今为止贝宁城最完整的建筑发展记录,并发现了金属加工等手工艺活动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追溯了城市发展轨迹,更让人们了解西非建筑、手工艺、贸易

和饮食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该考古项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与当地社区、学校开展合作,促进西非文化遗产的传承。该考古项目参与者、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考古学教授卡莱布·弗洛伦索(Caleb Folorunso)表示:“对于西非艺术博物馆来说,我们希望创建一个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中心。这里将成为西非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该中心建成后不仅将吸引非洲各地的民众,还将使研究人员无需远赴海外即可开展样本分析。”(赵琪/编译)